

法国哲学研究丛书

学术译丛

Le Système Des Objets

Baudrillard

修订译本

让·鲍德里亚——著 林志明——译

物体系

非外借

法国哲学研究丛书

学术译丛



Le Système
des Objets
Jean
Baudrillard

修订译本

物体系

[法] 让·鲍德里亚——著 林志明——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体系/(法)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著;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法国哲学研究丛书.学术译丛)

ISBN 978-7-208-15512-1

I. ①物… II. ①让… ②林… III. ①让·鲍德里亚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1592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物体系

[法]让·鲍德里亚 著 林志明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197,000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512-1/B·1370

定价 65.00 元

“法国哲学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莫伟民

——副主编——

杨大春 于奇智

——编委会成员——

(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芭芭拉·卡森 (Barbara Cassin) 崔伟锋 邓 刚 方向红 关群德
黄 作 贾江鸿 姜宇辉 克洛德·安贝尔 (Claude Imbert) 刘 哲
陆 扬 孟彦文 莫伟民 施 璇 屠友祥 汪 炜 王春明 王 恒
王礼平 王亚娟 吴珊珊 谢 晶 徐 晟 杨大春 于力平 于奇智
张莉莉 张尧均 张逸婧 赵 灿 赵 伟 朱 刚

总序

哲学经典翻译是一项艰巨的学术事业

法国哲学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哲学经典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想宝藏，法国哲学家是一座座高高耸立的思想丰碑。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托克维尔的民主学说、孔德的实证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巴什拉的科学研究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福柯的知识-权力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德勒兹的欲望机器理论、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利科的自身解释学、亨利的生命现象学、马里翁的给予现象学、巴迪欧的事件存在论……充满变革创新和勃勃生机的法国哲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为人类贡献了丰富多彩、灵动雅致的精神食粮，以其思想影响的广泛和深远而成为世界哲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哲学经典，对哲学家而言，是要加以批判超越的对象；对哲学工作者而言，是要像信徒捧读《圣经》那样加以信奉的宝典；

对普通读者来说，则多少是难解之谜。而如果没有了翻译转换，那所有这一切就无从谈起。

自从明朝末年至今，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已走过了大约四个世纪的历程，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渗透推动一个多元、开放和进取的精神世界不断向前发展。显而易见，传播者无论是外国传教士还是国人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不同语言文化思想如何转换的棘手难题。要在有着不同概念系统和概念化路径的两种哲学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转换并非易事。法国哲学经典的汉语翻译和传播当然也不例外。太多的实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绝大多数哲学文本的重要概念和术语的含义往往并不单一、并不一目了然。西文概念往往是一词多义（多种含义兼而有之），而任何翻译转换（尤其是中文翻译）往往都只能表达出其中一义，而隐去甚至丢失了其他含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选取一种较为接近原意、最能表达原意的译法。

如果学界现在还一味热衷于纠缠某个西文语词该翻译成何词而争论不休，则只会导致人们各执一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浪费各种资源（版面、时间、精力、口舌、笔墨）。多年前，哲学界关于“to be”究竟该翻译成“存在”还是“是”、“Dasein”究竟应该翻译成“亲在”还是“定在”甚或“此在”而众说纷纭，着实热闹过一阵子，至今也无定论。我想只要是圈内专业人士，当看到古希腊哲学的“to be”、康德的“diskursiv”、海德格尔的“Dasein”、萨特的“facticité”、福柯的“discipline”、德里达的“supplément”、利科的“soi-même”等西文语词时，无论谁选择了哪种译法，都不难想到这个语词的完整意义，都不难心领神会地理解该词的“多义性”。若圈内人士都有此境界，则纠结于某个西文语词究竟该怎样翻译，也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当然，由于译者的学术素养、学术态度而导致的

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天马行空般的译法肯定是不可取的。

哲学经典的翻译不仅需要娴熟的外语翻译技能和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宽广的知识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翻译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译者对文本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涉及语句的字面意义，还关系到上下文的语境，更是离不开哲学史和相关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等的知识和实践。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其实包含一个诠释过程。诠释不足和诠释过度都是翻译的大忌。可是，翻译转换过程中却又难以避免信息的丢失和信息的添加。值得提醒的是：可读性并不等于准确性。哲学经典翻译应追求“信、达、雅”的境界，但这应该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完全可以说哲学经典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学术活动。

不过，从译者个体来讲，总会存在程度不一的学识盲点、语言瓶颈、理解不准，因而难免在翻译转换时会词不达意甚至事与愿违，会出错，会有纰漏。虽说错误难免，但负责任的译者应该尽量做到少出错、不出大错。而从读者个体来讲，在保有批判态度的同时，最好也能有一个宽容的态度，不仅是对译者，也是对自己。因为难以理解的句子和文本，有可能是原作者的本意（难解），有可能是译者的错意（误解），有可能是读者的无意（不解）。第一种情况暗藏原作者的幽幽深意，第二种情况体现出译者的怅然无奈，第三种情况见证了读者的有限功底。学术经典传承应该是学术共同体的集体事业：写、译、读这三者构成了此项事业成败的三个关键环节。

“差异”“生成”“创新”“活力”和“灵动”铸就了几个世纪法国哲学的辉煌！我们欣慰地看到愈来愈多的青年才俊壮大了我国法国哲学研究和翻译的学术队伍。他们正用经典吹响思想的号角，热烈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我们有理由确信我国的法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物体系

拥抱经典！我们希望本译丛能为法国哲学文化的传承和研究尽到绵薄之力。

莫伟民

2018年5月29日写于光华楼

译序

描绘一个不存于任何地方的圆周

在这本书所置身的翻译系列里，常会出现一篇“导读”作为译作前引。然而本书所谈的正是消费的时代，而书本、思想、对消费社会的批评本身当然也有可能成为消费物品（“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建立于消费之上”——这是本书的结论之一）。如果“导读”成为一个取代物品的使用手册（mode d'emploi）或是 reader's digest，将是本书的一大反讽。况且“导读”中的“引导”，蕴涵着一项权力关系：读者（像小孩）是要被引导的，读法是要被规范的（不论那是作者的意图，还是译者或“导读”者所推荐的方式）。一本书，即使是译作，应该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吧！一本谈“物的体系”和人与物间关系的书，是不是也欢迎一个和读者之间的开放关系：（个人）使用、（学术）应用、批评的启发，甚至拥有、收藏，或是（变态）欲望关系？其实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读者去建立和书本的某一种特定关系或所有以上谈到的关系，如果那不是一种对权力关系的信仰？或是一个文化体系的系统性宰制？

那么，还能做些什么呢 (Que faire) ?

我找到了一个 (脆弱的) 平衡点, 在书的正文前, 提供一篇有关鲍德里亚 (我所认识的鲍德里亚) 和本书的“历史性”介绍, 因为历史正是符号消费在一个物品身上所要“抽象”之物。在书末, 则提出一篇个人的“阅读” (lecture), 以供有兴趣比对者参考。当然, 没有任何事物阻止读者跳过这两篇“边际”产物去读正文, 同样, 也没有任何事物能 (先验地) 阻止读者跳过正文, 把这两篇连起来当作译者的 digest。这里提出的只是一项游戏规则, 而任何游戏总是需要规则 (不论我们遵不遵守它, 或是遵守到什么样的程度)。让我们来尝试:

一、“他在所有地方, 也不在任何地方”

1990年, 译者初到法国, 决定比较研究巴特的《流行体系》 (*Système de la Mode*, 1967) 和鲍德里亚的《物体系》 (*Le Système des objets*, 1968)。大约是那时候吧, 我挂电话到巴黎第十大学 (Nanterre, 又称楠泰尔大学) 社会学系询问鲍德里亚的授课情况, 才知道他已经退休 (鲍德里亚在巴黎第十大学教学时期为 1966—1987 年^[1])。

“那么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呢?”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所有地方, 也不在任何地方。”

(Il est partout et nulle part.)

[1] Chris Rojek and Bryan S. Turner (ed.), *Forget Baudrilla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xvii, n. 7.

这似乎是一个鲍德里亚式的回答。

和鲍德里亚本人首次见面，仍是同一年的冬天，却是在埃菲尔铁塔上。那是一个为了纪念巴特逝世十周年而举行的“巴特与摄影”讨论会。主办人在致词时，谈到巴特曾称埃菲尔铁塔为一个使我们能看而本身又是被看的物品，所以特别选这个地方开会。在会场里，我偶尔望望在晨雾中静静流淌的塞纳河，偶尔也会去和那些看来有点情绪低落的观光客组成的零散群体交会 [在铁塔平台另一端，播放着和巴特有关的影片，之旁还有一个三度空间的全息录像 (hologramme)]。后来有人和我说鲍德里亚本人就在会场上。会中休息时，我凭着相片上的记忆找到了他，向他说明了我的研究意图。他显得有点胖，中等身高而且壮硕，穿着西装，但不打领带，让衬衫口开着。 [后来我观察到来会谈的学者分为两类，一群西装笔挺，一群则有 68 遗风 (?)，穿了西装外套但不打领带，且让襟口开着，当然女性着装又有不同之处。] 谈话的时间不长，内容也在记忆中模糊了大半。但记得鲍德里亚说他过去一段时间常和巴特来往，还曾一起去听萨特的研究课 (séminaires)。《物体系》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他还是蛮关心地问我进行得怎样。后来我向他要了电话，看着他走进电梯里，和他花费不少笔墨去书写的“群众”一起下楼消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鲍德里亚，已故的巴特成了中间人，布景则是摄影、观看和被看的机器、它所生出的群众，事件则是鲍德里亚意料之外的出现和消失。

再一次见到鲍德里亚，是在一个有关“波斯尼亚战争和媒体效应”之类的座谈会上，确切时间忘了，但这不重要。在座的还有其他知识分子，也许有保罗·维利里奥 (Paul Virilio，或者他说要来而没来)。这次，塞纳河上的晨雾换成了鲍德里亚头上缭绕的烟雾，我

看到他重复地说和听一些熟悉的主题和调子，似乎显得寂寥无奈。（这时我已熟读了鲍德里亚的所有作品，也知道“重复”在他书中的地位。）会后我去向他打招呼，这时我也世故多了，大概不再期待听到什么特别的说法。不过话题围绕着有人想要邀请他去台湾讲学一事：

“这位‘朋友’还没有打电话来。”（看来他似乎有些兴趣去台湾看看）

“你还有我的电话号码吗？”鲍德里亚问道。

“一直是同样那一个？”

“是的。”

“总是要打电话，碰到您的电话答录机？”（这时我已领教过他著名的答录机游戏规则——他总是在所有地方，又不在任何地方。）

“是的，就是这样！”

[当然，就像所有有意义的事物，这个号码后来也成为一一个遗失之物（objet perdu），也许它有一天会再出现？]

后来再听到鲍德里亚的消息（收音机上的访谈除外），则是一位朋友的姐姐过生日，他也出席了晚会，听说那天他表现得“很可爱”（bien aimable）（“有三个知识分子在场，我就溜了”，鲍德里亚在两三个地方说过这个有名的句子）。而人家会向我说这些，也是知道我正在进行鲍德里亚作品的中文翻译。

以上便是我和鲍德里亚本人的一些“相遇”（rencontre）和“非相遇”（non-rencontre）。

二、“祖父在死时 [才] 停止工作： [他是] 农夫……”

关于鲍德里亚的生平，我们知道得不多。不过资料也慢慢地在增加。

1929年7月，鲍德里亚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Reims），该市为法国香槟酒厂的重要据点，并有一座著名的哥德式大教堂，过去法国王室大多在此受加冕礼。

比较有力的家族描述，可以在他的《冷记忆 II》（*Cool Memories II*, 1987—1990）里找到：

祖父在死时 [才] 停止工作：农夫。父亲在年纪到达前就停止 [工作] 了：公务员，提前退休（他付出的代价是致命的多疑症，但事情必得如此）。我呢，我从未开始工作，因为很快地便得到了一个在边缘和有大量闲暇的职位：大学教师。孩子们呢，他们连小孩都不生了。就这样连锁反应下去，直到懒惰的终结阶段。（第 17 页）

在这一段文字里，鲍德里亚倒不是在自叙其社会谱系 [对社会学家的社会来源，人们总是很有兴趣，比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处境，不过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并不希望自己被称为“社会学家”]。这一段的上下文倒是一篇鲍德里亚的《懒惰颂》。下文他接着说：

这种懒惰的本质是农民式的。它的基础建立在一个功劳报偿和“自然”平衡的感情上。从来不要做太多。这是一项慎重和尊重的原则，对象是工作和土地的对等：农人有所付出，但是是由土地和神祇来给予所余之物：（那是）最本质必要的。这个原则尊重的是那些并非由工作且将永远不会由工作而来之物。

随着这个原则而来的，是对命定性的倾向癖性。懒惰是一种致命的策略，命定性是一种懒惰的策略。也就是从它身上，我得出一种既极端又懒惰的世界观。不论事情如何演变，我也不会去更改它。我憎恶我身边市民们的扰攘活动，他们的主动积极、社会责任、野心、竞争。这些是外部的、城市的、有竞争力有表现的、自命不凡的价值。这些是工业文明的品质。懒惰呢，则是一个自然的能量。（第 18 页）

一位中文的读者也许会说鲍德里亚是在谈“无为”之道。然而他的英美读者并不作如此想。他们认为他颂扬了农民的品德，要求人重视他的农民出身。因此鲍德里亚的一位重要的英语诠释者甘恩（Mike Gane），便是如此去理解类似的一段自我呈现（这是一段访谈）：

MA（Mike Gane & Monique Arnaud）：可以和我们谈谈您的青年时代吗？您的父母亲以何维生？首先对您在知识上有影响力的，是哪些人呢？

我的祖父母是农民。我的父母亲变成了公务员。这是一个家庭传统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了乡下，到城里定居。我可以说是家族里第一个去读书习业的人，当我离开老家去发展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一个决裂点。除了这些，我没什

么好说的。我并不是在一个知识环境里长大的——在我身边什么也没有——我的父母就是他们的样子，连小布尔乔亚都谈不上，或者，也许可以说是很低阶的小布尔乔亚。那不是有一个文化的环境。为了补偿这一点，我在高中阶段极度用功。那是进行一大堆原始积累的时候。那是在我生命中，真正努力用功以大量获取的一段时间。在此之后，我便和父母亲决裂了。这个脱离[父母家庭]在我的生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脱离父母亲之举动，建立了一种决裂的模式，之后又以相似的模式，影响了其他事物。我总是存在于一种虚拟的决裂状态中：与大学[决裂]，甚至与政治界[决裂]，而后者，我总是可以只在一种保持距离的方式里，被卷入其中。因此在我的童年、青少年等时期里，存在着一种原型。我没有进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我参加了高等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但没成功。所以我也没有成为一个拥有此种头衔的人物(agrégé)。我在20世纪60年代进了大学，但那是由一条迂回的路进去的。总而言之，以一种正常的职业生涯而言，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我说这些，一点也不是要和人针锋相对，因为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游戏，我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那也是那时代、我那一辈人有时会有有的想法。你靠什么都可以维生，而能量来自决裂。而今天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为何我和大学搭不上调的原因：即使和学生之间，不论什么事，诱惑啦和所有那一大套，那时都有一种共谋感，这种感觉持续了十到十五年，然后全都变了，大学变成了一个陌生和令人厌倦的环境；在这种世界里，我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我很幸运，可以在60、70年代里，生活在巴黎第十大学，那是它最好的时光。一旦这些结

束了，我们便大为悲叹。我们也没有做得那么好，我们便忧郁起来。事情便是这样。但后来事物变得死气沉沉；它们变得像是葬礼一样，阴森森的，连巴黎第十大学都一样。所以我就离开了。我实在应该早点离开的。但这一点我也没有做得很成功，而且我也不像是要另起炉灶。我不认为那时候，我那一辈人里，有许多另起炉灶的成功例子。因此今天真的是……因为那时代，在那里的人，我们的导师，不过，他们老实说不是老师，而是父亲，那时候都死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都消失了。我不想对这些有什么怀旧情绪。相反的，回顾起来，我是比较幸运的，可以在那样的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于巴黎第十大学、巴黎。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的。话虽如此，所有的事物都消亡了。[1]

当人们问他如何自我“定位”（别忘了“定位”往往是一种化约）时，鲍德里亚的回答则是一个反定位。问题如下：

DG/DS (D.Guillemot & D.Soutif)：您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作家、诗人，以上皆非或以上皆是？

我既非哲学家亦非社会学家。我没有遵循学院生涯轨迹，也没有遵循体制步骤。我在大学里教社会学，但我并不认为我是社会学家或是做[专业]哲学的哲学家。理论家？我很愿意；

[1] “I Don't Belong to the Club, to the Seraglio” (Interview with Mike Gane and Monique Arnaud) in Mike Gane (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19—20. 访谈进行的时间为1991年11月。

我们还注意到这里鲍德里亚正在说明他的双重断裂(double rupture)，这个情况使得他陷入“两面不是人”的困境中（但也是他的魅力来源之一）：

发自肺腑地反对“喔，没什么用”的态度(anti-bôf)，反对大众、反对深沉的法国。但也是同样发自肺腑地反对精英、反对种姓阶级、反对文化、反对特权阶级。要站在愚昧的大众那边，或是站在自大的特权阶级那边呢（当他们散发出煽动群众式的良好谦卑时，更是自大）？此题无解。(Fragments, *Cool Memories III* 1991—1995, Ed. Galil, 1995, p.144.)

形上学家？就极端的角度而言才是；人性和风俗德行的思索者（moraliste）？我不知道。我的作品从来就不是大学学院式的，但它也不会因此而更有文学性。它在演变，它变得比较不那么理论化，也不再费心提供证据和引用参考。[1]

鲍德里亚这里的回答和《致命策略》（*Les Stratégies Fatales*, 1983）一书相关。在该书的袖珍版正文前，编者附上了这一段访谈，并且声明鲍德里亚是一位“无法归类的”思想家，而其作品有时使人感到困惑。然而鲍德里亚在台湾 [学界对他思想的译介主要承袭英美而来。[2] 不过英美的阅读本身也在转向，比如 1996 年出版的鲍德里亚思想研究专著（Charles Levin, *Jean Baudrillard: A Study in Cultural Metaphysics*, H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Europe, 1996）。《物体系》在该书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量讨论和引用]，惯常被人当作拟像（simulacre）理论家和后现代思想家。对于前者，鲍德里亚曾说过：“去断言说‘我们是在模拟阶段（state of simulation）中’，会成为没有意义的事，因为在那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像是死去一般的阶段。当你认为你是在模拟的阶段时，你已经不在那儿了。这里的误解在于把我的这种理论，转变为一个参考权威。而在此处不应该有任何参考权

[1] “Interview avec D. Guillemot et D. Soutif”, *Psychologie*, mai, 1983. In Mike Gane (ed.), *Baudrillard Live*, op. cit. p.43.

[2] 台北《当代》月刊曾于 1991 年 9 月出版一期鲍德里亚专辑（N°65）。其中刊出两篇译文，可惜皆不理想（两篇皆由英文转译）。题名为《公元两千年会发生》的一篇（张钊维译），和原文标题意思正好相反。法文原题为“L’an 2000 ne passera pas”（*Traverses*, n°33/34, jan, 1985, C. C. I, pp.8—16），应译为《西元两千年不会发生》（或译作《西元两千年过不了》，可能更贴近法文原题一些细腻的意涵）。此一译文与原文大异其趣的地方，还在于将文中每一段再切成小段，甚至以一句作为一段（像是在写诗或喊口号）。然而原文仍是通常的论述形式，语句相互连属。并且译文这么一做，原本的段落反而完全看不出来。另一篇蔡崇隆译的《消费社会与消费欲望》，来自《消费社会》一书中原不相连的两章，但译者并未加以说明。其中 drugstore 被译为杂货店，其实那是巴黎的一家连锁综合商业中心，只是袭用了英文词（在此若加上括弧作为专有名词，可避免误解）。另外 Parley 2，译注为“法国——计划性社区”，而它应该主要是一座超大型购物中心，只是和新的集合性社区整个地连在一起（或者反过来说，购物中心的模态延伸到整个聚合体里，使它成为原来城市的 double-Parley 2 号，Parley 的魅影）。